

壹、前言

2020年新冠肺炎爆發，暴露出中國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缺陷。由於習近平逐步強化集權領導，要求國家機器各階層必須與「習核心」保持高度一致，使地方幹部將「領導重視的項目」視為優先順位，對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缺乏警覺性，更因「壓力型體制」的制約，面對危機事件時選擇坐等中央決定，錯失防疫先機。另外，受到疫情影響，中國各地財政收支情形更加惡化，中央制定的減稅政策與績效壓力，使得地方政府亟需尋找其他財政來源，再加上大學畢業生與農民工失業風險依舊存在，皆為中國的社會穩定埋下隱患。2020年初期，中國內外學者專家紛紛研判，新冠肺炎疫情可能影響中國政治與社會體制，為習近平在黨與國家的地位帶來致命打擊。但隨著疫情在全球蔓延與中共「動員式」抗疫的成效，習近平仍維持其「定於一尊」的政治格局，甚至進一步強化對社會的控制。

本文觀察疫情對中國治理體系與統治正當性所帶來的挑戰，藉此檢視中共在後疫情時代採取那些舉措強勢維穩，並討論未來中國國家與社會關係的發展。

* 陳穎萱，國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軍與作戰概念所政策分析員。

貳、疫情對中國維穩的挑戰

一、疫情暴露中國政府體制弊端

中國的中央與地方關係（央地關係）可從政治、經濟與公共行政等不同視角，推導出互動模型，亦可依照歷史與實際情況，歸納出中國體制運行模式。「壓力型體制」認為「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是地方政府最主要的壓力來源。中央政府和各級黨委等上級組織在確定哪些項目屬於「重要政治任務」後，下級職能部門動員所有資源與人力向這些政治任務傾斜，上級組織則根據下級組織的執行績效給予政治和經濟方面的獎懲。¹ 習近平主政後，依序進行人事調遷、打擊貪腐，以及更改考核指標展現中央權威。「強中央」與「弱地方」的格局更為明顯，短期雖有利於加強中央對政治與宏觀經濟的掌控，長期卻不利於地方政府的積極性與主動性，給予幹部明哲保身的動機，面對緊急事件時寧願選擇坐等中央決定，以避免犯錯後續被黨與國家究責。另外，史丹佛大學周雪光教授認為，中國「剛性體制」雖得以迅速有力地執行自上而下的指令，但卻不利「自下而上」的訊息傳遞，而訊息流動不暢或存在高度不確定時，就會導致決策過程的拖延不決。且中國政府在決策過程中，自上而下的政治壓力取代專業知識和精神行事，成為下級組織處理各種事務的依據，故在疫情事件中導致嚴重的後果。²

新冠肺炎疫情自 2019 年 12 月在武漢市初現端倪以來，地方政府反應明顯滯後。在防疫黃金期間，武漢市長公開行程多為「脫貧攻堅」、「不忘初心」等「習核心」指示的重要政治任務。同一時間，包含李文亮在內的多位醫師，因在網路上發布不明原因肺炎傳播的消息遭到約談與查處。

¹ 楊雪東，〈壓力型體制：一個概念的簡明史〉，《社會科學》，2012 年第 11 期（2012 年 11 月），頁 5。

² 〈社會學家周雪光談肺炎危機（上）：中國官僚如何失去了主見和能動性？〉，《端傳媒》，2020 年 2 月 18 日，<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00218-opinion-zhouxueguang-epidemics-and-chinese-bureaucracy/>；〈周雪光專訪：新冠疫情暴露「剛性」體制弊端〉，《BBC 中文網》，2020 年 3 月 3 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51703169>。

研究推論中國一級單位與國家疾控中心，可能早已掌握武漢肺炎「人傳人」的證據，但中國政府卻未在第一時間阻止疫情的擴散，反而是緊縮相關言論，甚至隱匿病情，各種資訊在網路流傳讓人民恐慌，也造成疫情持續擴散，最終惡化到難以控制的程度。中國的「壓力型體制」雖有利目標訂定與政策執行，但疫情亦凸顯該體制的僵硬性與脆弱性，從而引發外界對中國威權體制的質疑聲浪。

二、地方政府為達績效引發民眾不滿

在新冠肺炎影響之下，中共中央不斷強調「六穩」、「六保」，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於5月「政府工作報告」宣布中國將減稅降費超過2.5萬億人民幣，³部分地方政府為迎合上意，亦自主降低稅負。⁴但中國地方政府的預算收入目標通常於前一年12月訂定，當年1月通過，再加上層層加碼，造成基層財政收入目標往往比較高。受到大規模減稅降費、經濟下行壓力與外部複雜形勢影響，以及中央所訂定的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決戰決勝脫貧攻堅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等「重要政治任務」仍須經費完成與落實，讓地方政府面臨落實減稅降費與組織完成目標任務的兩難。地方政府為取得短期財政平衡，想方設法從其他項目中取得財政來源。媒體報導中國部分地區5月解除封城後，高速公路恢復收費卻大幅漲價；⁵而受到疫情影響，中國各地再次興起「罰款經濟」，中國國務院督查組10月發現河北、山東與河南等多個省市政府部門，在公路上違規設立限高設施和檢查關卡遭到民眾投訴。⁶

³ 〈2020年政府工作報告〉，中國政府網，2020年5月22日，<https://reurl.cc/n04M21>。

⁴ 天津市2020年前三季新增減稅降費累計達438.8億人民幣，2020年發布的支持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稅費優惠政策新增減稅降費288.6億人民幣；四川前三季度新增減稅降費超370億元。〈天津：前三季新增減稅降費438.8億元〉，《新華社》，2020年11月9日，http://www.tj.xinhuanet.com/news/2020-11/09/c_1126715488.htm；〈四川前三季度新增減稅降費超370億元〉，《新華社》，2020年11月8日，<https://reurl.cc/00ley9>。

⁵ 〈解封後中國高速公路收費暴漲民怨斥如土匪攔路搶錢〉，《自由時報》，2020年5月13日，<https://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3163859>。

⁶ 〈督查組暗訪違規限高設卡：500米5個限高桿省道近在眼前卻要繞半天〉，《央視》，2020年10月10日，<https://reurl.cc/Mdxa2m>。

另外，近年來中國各地展開新一波的土地改革，將目光瞄準農村的「宅基地」。地方政府由於財政緊絀，計劃向農村宅基地全面徵收使用費，如河南省近期推行徵費政策，對「一戶一宅」超標占用部分按階梯收費。⁷ 地方政府亦透過「合村併居」、「異地搬遷」等方式，將農村原用於蓋房子的土地復墾為耕地，釋放出城鎮建設用地指標，再將指標售予建商換取經費安置貧困戶。此舉不但可以提高土地使用效率，也能夠創造GDP與稅收，更能完成中央規定的扶貧績效。但中國長期關注「三農」問題的長江學者賀雪峰直言，各地方政府花費巨大成本進行宅基地改革，不但沒有增加土地資源，反而造成農民生產不便，讓農民失去農村這個基本保障。⁸ 更有基層幹部在執行過程中，收取建商賄賂，強制村民併村、進城、上樓，肆意轉讓土地與在行政審批過程圖利建商。2020年11月5日，四川省成都市發生強制徵地衝突，而這樣的事件在中國屢見不鮮。

地方政府為「開源節流」縮減民生開支、大幅舉債，或是「亂收費」，甚至傳出有地方聲稱受疫情影響，拖欠教師與基層公務員薪資。種種事件皆累積中國人民對地方政府與基層幹部的不滿，且可能逐漸上升為對政治體制的不信任感，進而為群體性抗爭埋下隱患。

三、失業潮與集體事件頻傳

自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2020年4月23日提出「六保」（著力保居民就業、保基本民生、保市場主體、保糧食能源安全、保產業鏈供應鏈穩定、保基層運轉）以來，中共中央便將「著力保居民就業」列為首要工作。11月6日，李克強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表示，疫情對農民工、貧困戶與靈活就業人員造成較大影響，要求政府要過「緊日子」，將節省下來的資金重點用於穩住基本民生。⁹ 在「壓力型體制」下，地方政府承接上級政治

⁷ 〈土地市場大變革？農村宅基地也要收費，河南新政來了：超過167坪按階梯計費〉，《東方財富網》，2020年11月10日，<http://finance.eastmoney.com/a/202011101694749651.html>。

⁸ 〈賀雪峰：何必與農民宅基地過不去〉，《新華社》融媒體「奇文天下」，2020年10月27日，<https://3g.163.com/dy/article/FPUE96850530ICNH.html>。

⁹ 〈李克強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新華社》，2020年11月6日，<https://reurl.cc/XkN90g>。

任務，將農民工與大學生視為「就業重點幫扶對象」，試圖安撫民心，降低社會不穩定的風險。

2020年10月19日，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2020年9月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為5.4%，其中20-24歲大學以上人口失業率雖比8月下降，但仍高於2019年同期0.6%，發言人劉愛華坦言「2020年的就業壓力對大學畢業生來說仍較大」。中國政府已要求國有企業與政府單位招聘應屆畢業生、軍隊重點招募大學生、鼓勵創業及包裝新興職缺名詞（如傳媒行銷專員、規劃師），以求降低大學生失業率。雖然企業依照政府要求擴大應屆大學畢業生的招聘職缺，但真正有職位招聘計畫和人才需求的單位不多，根據中國人民大學調查顯示，2020年第三季中國年輕人職缺數量比2019年同期下降5%，但求職者數量卻增加近兩成，¹⁰顯示中國就業市場競爭更為激烈。由於求職焦慮易牽動大學生對政府與社會不公的憤怒情緒，再加上中國網路世代深諳社群媒體操作且傳播方式多元，增加輿情監控難度，稍有不慎就可能引發網路串連，故當局將其視為重點維穩對象。

另外，在農民工就業方面，由於新冠肺炎疫情主要影響製造、建築與餐飲等產業，在全球封城和供應鏈停頓下難免少收原料和訂單，導致減產停工。其中農民工與中低收入階層大多儲蓄較低，沒有緊急預備金抵禦衝擊，且工作單位通常未將其納入失業保險，因此政府難以通過社會保障措施提供援助。一旦現金流斷裂影響生存，很可能引發農民工不滿而集結，引發群體性突發事件威脅社會安全。根據香港非政府組織「中國勞動透視」調查報告顯示，有近七成的湖北籍勞工得不到工資，即使復工也可能減薪五成；四川省亦有六成多的單位未正常發放工資。¹¹「中國勞工通訊」（China Labour Bulletin, CLB）統計資料亦顯示，2020年1月至今，中國共發生662起工人集體行動事件，集中於廣東、江蘇與山東等地，肇因多

¹⁰ 〈中國經濟復甦，青年嘆找不到工作〉，《科技新報》，2020年10月21日，<https://reurl.cc/4mvMvv>。

¹¹ 〈疫情期間職工復工情況調查報告（一）：不到三成職工延期復工期間正常發放工資〉，中國勞動透視，2020年7月16日，<https://reurl.cc/d5lobM>；〈川渝農村地區復工調查：多項勞動權益保障政策未被落實〉，中國勞動透視，2020年8月24日，<https://reurl.cc/GrLYRG>。

為抗議企業因疫情拖欠薪資或裁員（如圖 11-1）。雖然目前發生的社會抗爭無論是規模力度、延續性與媒體報導聲量，皆不如 2018 年卡車司機聯合罷工或 2019 年珠海偉創力公司工人抗議等事件，但若農民工失業情形加劇，或可能串聯不同抗爭群體與擴大衝突範圍，進一步挑戰中國社會維穩。



圖 11-1 2020 年 1~11 月中國工人集體行動地圖（截至 11 月 23 日）

資料來源：〈工人集體行動地圖〉，中國勞工通訊，<https://reurl.cc/q84AeR>。

參、中共藉疫情強化社會控制

一、中央採「動員式防疫」穩定民心

直至疫情規模已擴散到難以掩蓋的程度，中共中央終於決定採取空前嚴厲地強制性防疫政策。2020 年 1 月 20 日習近平首度回應後，在短短 17 天內發表 7 次相關談話，強調其「親自指揮、親自部署」；國務院副總理孫春蘭、總理李克強與習近平本人皆親赴武漢，展現政府防疫工作的

積極作為，挽回民眾信任。湖北省及其周邊城市共有 6,000 萬人進入檢疫隔離狀態，地方幹部地毯式排查潛在的新冠病毒感染者，並將疑似病患送去隔離站；在遠離疫情中心的其他城市，則對居民外出次數、活動範圍擬定出嚴格規定，且利用一系列新型監控技術來監督居民的執行情況。與此同時，湖北省紅十字會副會長張欽、湖北省委書記蔣超良等數百名官員因「失職失責」及其他違反中共黨紀的行為，紛紛被懲處或免職，部分職位由習近平的親信接替。

另外，中共中央亦成立「應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領導小組」（簡稱防疫領導小組），負責防疫工作的領導和統籌協調。¹² 該小組與 2003 年「國務院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揮部」相比，前者由中共中央直接指揮，且成員包含 4 名政治局委員與 3 名國務委員，權威性更高。然而防疫領導小組成員當中並沒有衛健委、發改委等技術官僚，且由分管宣傳的政治局常委王滬寧擔任副小組長，中宣部部長黃坤明、北京市委書記蔡奇為組員，可應證中共的防疫重點一直以安定民心、維護社會穩定為主軸，而非重視人民生命財產安全。

根據 4 月 21 日《新華社》報導，為化解疫情涉及的各種社會矛盾，中共中央決定成立「平安中國建設協調小組」，其任務包含依法防範打擊危害國家政治安全活動、深入開展涉疫矛盾糾紛排查化解、打好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決勝戰、推進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試點、加強公共安全管理與有效防控網路安全風險等。¹³ 該小組目前公開的專項組包含：公共安全組（應急管理部部長尚勇擔任組長）、社會治安組（公安部副部長林銳擔任組長）、市域社會治理組（中央政法委副秘書長王洪祥擔任組長）、政治安全專項組（中央政法委副秘書長雷東生擔任組長）、維護社會穩定組（中央政法委副秘書長白少康擔任組長），未來可能將宣布與網路安全相

¹² 該小組成員包含小組長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副組長中央書記處書記王滬寧（加強幹部監督）、中辦主任丁薛祥與國務院秘書長肖捷（黨、政大總管，負責協調）、中宣部部長黃坤明、外交部長王毅、公安部部長趙克志（負責輿論管控、國際合作、社會維穩），及北京市委書記蔡奇（凸顯首都防疫重要性）。

¹³ 〈郭聲琨主持召開平安中國建設協調小組第一次會議〉，《新華社》，2020 年 4 月 21 日，<https://reurl.cc/147Eg8>。

關的專項組，確保中國全方位「平安」。「平安中國建設協調小組」除展現習近平「穩定壓倒一切」的意志，負責統籌規劃與制度建設，同時確保中央指示得以快速貫徹外，也可預期習近平希望循「小組治國」模式，進一步掌握政法系統，為「習核心」上多重保險。但依照中國現行體制，負責國家安全的機構已有國安部、公安部、政法委等部門，亦有由習近平擔任主席的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等議事協調機構，未來平安中國建設小組與各部門間的職能分工，以及究竟能發揮多少功效，仍有待觀察。

美國學者福山 (Francis Fukuyama) 2020 年 3 月在《大西洋雜誌》(*The Atlantic*) 撰文認為，因為集權政體與民主國家在疫情下皆有正 / 負面案例，決定防疫表現的關鍵性因素並非政治體制的類型，而是一個政府的能力與人民對政府信任。¹⁴ 中共深知其統治正當性源於治理績效，故積極展現集權體制下「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點。

二、加強社會監控

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漢初現端倪期間，地方當局已在網上嚴格審查訊息傳播，但隨著大眾對病毒的憂心與恐懼感逐漸提高，中國部分公民記者與維權人士利用政府反應遲緩的空窗期，在網上透過自媒體直播或貼文，分享新型冠狀肺炎疫情蔓延的訊息，並反思中國政府治理體系對疫情的影響。2 月 3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疫情防控工作相關會議後，對網路言論審查的力度開始加大。2 月 5 日，中國國家網信辦發布通知，表示將對「皮皮搞笑」網路社區平台發布涉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有害短片、散布恐慌情緒等訊息進行「嚴肅處理」，並對新浪微博、騰訊、字節跳動 (抖音) 等網站平台進行督導。¹⁵ 自此，平台開始刪除個人微信帳號貼文，甚至關閉帳號；串流媒體平台和微信公眾號刪除批評性報導，中

¹⁴ Francis Fukuyama, "The Thing That Determines a Country's Resistance to the Coronavirus," *The Atlantic*, March 30, 2020, <https://reurl.cc/8nAMLj>.

¹⁵ 〈國家網信辦指導有關地方網信辦依法查處違法違規網站平台及帳號〉，中共中央網絡安全和資訊化委員會辦公室，2020 年 2 月 5 日，<https://reurl.cc/VXOXE5>。

國政府更發布關於刑事起訴的新規定，針對利用社交媒體傳播病毒相關謠言、批評政府對危機的反應，或妨礙政府對抗肺炎疫情，可以依法逮捕或起訴。根據中國最高人民檢察院 7 月 20 日數據，2020 年上半年中國全國檢察機關受理審查、逮捕妨害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犯罪共計 6,624 人，批准和決定逮捕 5,370 人；受理審查起訴 8,991 人，決定起訴 5,565 人。¹⁶ 另外，觀察中國刪除微博、百度等貼文的內容以及獲起訴的犯罪類型可以發現，中共最在意的並非是對領導人的批評或是對政府防疫不利的控訴，而是煽動群眾聚集的貼文，此一現象顯示中共對疫情訊息傳播與民心不滿可能帶來的民主化、自由化與提供民眾串連的途徑等現象感到忌憚。

根據美國「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 報告，許多國家與非國家行為者，利用新冠肺炎疫情來重塑戰略敘事、審查批評言論與建立新的社會控制體系。2020 年全球網路出現三個明顯趨勢：其一是政治領導人以疫情為借口，限制用戶獲取資訊；其次，政府當局利用抗疫來合理化擴大監視和部署曾被認為過於侵犯個人隱私的新技術；最後是出現全面爭奪網路主權的競賽，每個政府都以限制訊息跨境流通的方式，實施自身互聯網法規。¹⁷ 上述三個趨勢與中國在疫情期間強化社會控制的發展方向一致。2020 年 3 月，中國通過《網絡信息內容生態治理規定》，對中國境內網路言論空間產生進一步衝擊。中國利用 AI、大數據與機器學習等技術，以及遍布中國的監視器、天網與社會信用制度，讓中共得以「無所不知」，且以維護網路環境文明健康為藉口，對網路的使用者與供應者皆設下嚴格的規範，除要求網路供應者接受國家監督，也要求這些供應者自我審查，主動刪除官方認為「不適當」的言論與貼文。學者認為，該法的各項鼓勵與禁止事項界定寬泛且恣意，致使中國的網路世界正向一個互相監督、彼此猜疑的「全景式監獄」(panopticon) 快速成形中。¹⁸

16 〈最高檢：上半年 5565 人妨害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犯罪被訴〉，《法治新聞》，2020 年 7 月 20 日，<http://news.cctv.com/2020/07/20/ARTIDeWephd15q9M6PgEzvxc200720.shtml>。

17 Adrian Shahbaz, Allie Funk, “The pandemic is fueling digital repression worldwide,” Freedom House, <https://freedomhouse.org/report/freedom-net/2020/pandemics-digital-shadow>.

18 〈中國擴大箝制網路 學者：「以黨領網」在習核心下快速成形〉，《自由時報》，2020 年 6 月 25 日，<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3208657>。

中共運用科技管控社會的技術，在後疫情時代也日益增強。根據英國網路服務安全公司 Comparitech 報告，中國由國家安裝的監視器數量占全球的五成，全球安裝監視器最多的 20 個城市中，就有 18 個位於中國，其中最密集的是山西省太原市，平均每千人被高達 119.57 個監視器監視。¹⁹另外，中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與中國電子科技集團合作開發 APP，蒐集衛健委、交通部、中國鐵路、民航總局等相關機構的數據，方便民眾得知自己是否和感染者有過近距離接觸；中國各省市因應新冠肺炎疫情推出的「健康碼」政策亦逐漸普及，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甚於 11 月 G20 峰會上鼓吹全球建立新冠病毒檢測資料、國際統一通用的健康碼互認機制。²⁰目前中國人民出入公共場所時，包括商場、地鐵與辦公室等，都必須提供「綠色」健康碼，證明自己「健康」，因類似應用程式要求用戶提供電話號碼和身分證號，共享私人就醫紀錄，非常有可能被中國政府用來收集用戶其他個人數據。中國因應疫情的監控科技引發大眾對個人資料與隱私，以及對收集來的數據進行長期或其他目的使用的擔憂。

三、鼓吹民族主義

新冠肺炎疫情擴散到全球，以及中共中央動員式防疫初獲成效後，中國欲極力扭轉先前放任疫情爆發、隱瞞疫情造成失控的惡劣形象，對內發起大規模政治宣傳運動加強人民對中共的向心力。中國官媒反覆使用軍事術語，把與病毒的對抗稱為「戰疫」、醫務人員與解放軍為「前線英雄」，激起民眾的愛國心。對外則發布中國援助各國抗疫的消息，藉此提升中國的國際地位、重要性和影響力。疫情下中美日漸緊張的關係亦激發民族主義蔓延，中國社群平台「B 站」、「抖音」上，外籍頻道主分享各國新冠疫情或反種族歧視集會的種種亂象（如圖 11-2），強調美國與其他

¹⁹ Paul Bischoff, "Surveillance camera statistics: which cities have the most CCTV cameras?," Comparitech, July 22, 2020, <https://reurl.cc/R1G1b6>.

²⁰ Karen Yeung, "Coronavirus: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proposes global QR code system to help free up travel," *SCMP*, November 22, 2020, <https://reurl.cc/ldbW9Q>.

歐洲民主國家無力處理疫情擴散，而中共的集權體制有利於阻止疫情在中國繼續傳播。另外，中共亦透過各種愛國運動轉移焦點，宣洩大眾對政府治理不佳、經濟下滑所形成的不滿。如為慶祝建政 70 周年，共青團發起「我與國旗合個影」活動，鼓勵用戶在網路平台標註 #我和國旗合個影#、#IloveChina# 參與活動，拍攝與五星旗合影的照片及影片上傳；中國影片分享網站「Bilibili」推出「102 位 up 主花式演繹《我和我的祖國》」等。

中國透過各種動員，進一步激發年輕人的愛國主義，讓所有年輕族群團結在「黨的周圍」，成為「黨的先鋒」。大量的「鍵盤政治家」（鍵盤政治家）在中國內外圍剿討伐對中國領導人的任何批評或被認定為對國家不忠誠的行為，並將其上升到「關乎民族意志和愛國主義戰鬥」。如中國作家方方因在疫情期間以日記形式記錄其見聞與感想的《武漢日記》不斷受到攻擊；中國著名自媒體帳戶發布影片，鼓勵中國人勇敢站出來「正面迎接挑戰」，「入關學」引發網路熱議，播放量達 B 站全站排行第 17 名。²¹ 中國的宣傳機器已經掌握在大眾媒體和社群媒體時代，如何與中國的年輕一代溝通，許多「90 後」、「00 後」被官方引導成狂熱的愛國主義者。官方亦放任充滿「愛國情緒」的網民主動攻擊不符合中國利益的網路言論。但這種這種民族主義情緒的壓力，無助於解決中國當前政經困局，反而容易因民族主義甚至民粹主義快速生長，使戰爭威脅擴大，與中共宣稱的「和平正義」差距甚遠。

²¹ 8 月 8 日署名為「山高縣」帳號在中國網路影音分享平台「Bilibili」發布演講，將美國比喻成虛弱不堪的「惡龍」，鼓勵中國人勇敢站出來「正面迎接挑戰」。該帳號曾在中國問答網站「知乎」回應「中國人從明亡的歷史中學到過哪些歷史教訓？」此一提問，被稱為「入關學」創始人。



圖 11-2 中國「B 站」影音平台關於外國防疫現況影片

資料來源：作者參考平台搜尋內容自行繪製，<https://reurl.cc/GrL2aD>。

肆、小結

綜言之，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的爆發，暴露出中國國家治理體系「自上而下」的「壓力型體制」弊端。在強大地集權過程中，各種規章制度與條條框框越來越多，且特別強調官員的「忠誠」、「始終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雖然有利於地方迅速執行中央政府指令，但其缺點為不能及時傳遞自下而上的訊息，造成面對突發性危機時，政府啟動因應對策的時間滯後。另外，中國各地財政收支情形隨著疫情影響更加惡化，中央制定的減稅政策與績效壓力，使得地方政府為尋找其他財政來源不擇手段，如「亂收費」陋習再度興起、政府將目光瞄準農村「宅基地」等，造成民眾與地方政府的衝突。再加上大學畢業生與農民工失業風險仍大，各地頻傳工人集體維權事件，種種挑戰皆為中國的社會穩定埋下隱患。

然而，外界在疫情初期對「疫情是習近平上台以來所面臨的最大挑戰，也是中共所面臨的最大執政危機」的預估，目前看起來已初步獲得緩

解，中國後期透過集權國家的龐大權力，有效而暢通無阻地對民眾進行核酸檢測，並實施強制隔離，中共宣稱「中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鬥爭取得重大戰略成果，充分展現中國共產黨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顯著優勢政治」。在此前提下，習近平挾「抗疫」之名，在政治上強化頂層設計、強化監視工具技術，並對社會各階層進行更加嚴密地控制。但若僅看到「壓力型體制」在控制疫情中的有效動員，一味地讚揚集權體制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而忽略這個體制在自下而上的訊息接收與傳遞阻礙、各級官員缺乏主觀能動性與社會力量無法有效協助政府、社會不滿情緒難獲有效處理等種種問題，即便中國在部分較為極端的防疫措施上執行「效率」更佳，若再發生突發性公衛事件，中國仍很有可能重蹈覆轍。而在疫情過後，傷害最深的不是中國政府，而是中國人民，其犧牲的不只是「健康」，還有更多的「自由」。